

明代南直隶江南地区 私人刻书概述

叶 树 声

我国明代私人刻书盛行，书坊分布很广。明胡应麟说：“余所见当今刻书，苏常为上，金陵次之，杭又次之。近湖刻歙刻骤精，遂与苏常争价。^①”胡氏虽是评价刻书质量，却也交待了私人刻书的主要地点。江苏的刻书中心在金陵，其次是苏州、无锡、常州这一地区（下称“苏州地区”）私人刻书也很多。安徽的刻书中心在徽州（今歙县）。这些地方均处江南，在明代同属于南直隶所辖。当时这一地区私人刻书不论是在数量和质量方面，还是在刻印技术及其经验积累方面，在全国都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，所以值得进行探讨。

一、明代南直隶江南地区私人刻书兴起的背景

（一）明代前期社会比较安定，社会经济有所发展。

朱元璋曾参加过农民起义军，深知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，元代来去匆匆的历史教训，他不得不吸取。他说，“恣意奢欲，使百姓困乏”，就将“至于亡乱”。^②他反复告诫子孙和臣僚，要“取之有制，用之有节”，若置百姓死活不顾，横征暴敛，就如同骑士“急衔勒、厉鞭策、求聘不已，鲜不颠蹶，马既颠蹶，人独能无伤乎？”^③他建都金陵后，为了长治久安，采取了一系列措施。为整顿和维护社会秩序，他建立了“黄册、鱼鳞册”户籍制度和“里甲”乡村管理制度，使百姓在逃乱中稳定下来，并实行了奖

励垦荒政策，他又提倡兴修水利。施行这些措施的结果，使农业生产发展较快。“是时，宇内富庶，赋入盈羨，米粟自输京师百万石外，府县仓廩蓄积甚丰，至红腐不可食”^④。在工商业和税收方面，也实行了新的政策，如采矿，他取消了限制人民开采铁矿的禁令，“令民得自采炼，每三十分取其二”^⑤。在税收方面，较元有所减轻，规定商税“三十而取一”。其结果，使明代前期社会比较稳定，社会经济也得到了恢复和发展。

南直隶地处江南，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和劳力充足等因素，社会经济更显繁荣。当时全国较大商业城市四十余座，其中金陵数一数二，城内商店林立，百货云集，“塌房”遍布大街小巷。苏州、松江、扬州、徽州也都是当时的重要商业城市。苏州、松江主要是纺织品集散地。值得一提的是徽州。据《歙县志》记载，当时徽州“田少民稠，商贾居十之七”。

明代前期稳定的社会为刻书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安定的社会环境，南直隶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，是这里刻书手工业发展的基础。

（二）文教事业比较发达，社会用书量很大。

朱元璋虽出身行伍，也略通文墨。他深知“武定祸乱，文致太平”的道理^⑥。建都后，首先在京师金陵兴办国子监，以培养选拔人才。当时在此就读的，除域内监生外，“日本、琉球、暹罗诸国，亦皆有官生入学读书，辄加厚赐”^⑦。永乐十八年（1204年），这里学生多达九千余人。在当时来说，它不仅是亚洲的最高学府，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学校^⑧。在太学影响下，其他儒学相继兴起，使京师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，也是文化教育中心。明太祖不仅重视京师办学，也重视郡县立学。由于明初重教育和通过儒学选才入仕，激发了民众的诵读热情。于是各地儒学纷纷兴起。

南直隶江南地区，当时因有京师所在，受其影响，各地儒学

大兴，文风昌盛。明清时期，“天下书院最盛者，无过东林、江右、关中、徽州^⑨。”明时，徽州“书院勃兴，到了清初，徽属六县计有书院五十四所^⑩。”其中以徽州府所在地歙县最为突出。

当时南直隶江南地区人民生活较为富裕。当他们物质生活稍有改善，便要求提高文化生活。他们一般喜欢阅读小说、诗歌、戏曲等通俗读物。有些人经济地位提高后，便对政治地位有一定的要求，渴望通过读书挤入仕林。在这方面，徽州地区较为明显。民间因文化生活和教育等需要用书量很大，这些书主要由本地区私人书坊刻出。

（三）私人刻书条件较为优越。私人刻书主要条件是人力、财力和刻印图书用料来源。明洪武二十六年南直隶共有人口一千零七十五万五千九百三十八人^⑪，其人口密度当时居全国第三。而南直隶江南山多田少，劳力有余。明代中期，全国土地兼并剧烈，南直隶江南地区也不例外，“有田者什一，为人佃作者什九”^⑫。失去土地的农民，大批流入城镇，为包括刻书手工业在内的工业发展，提供了廉价的劳力。这里的富商又为开设书坊经营刻书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条件。比如在歙县，“徽多巨商，饶于财，收书刻书，条件优越，故刻书有特别精美者，为他处所不及”^⑬。徽州自唐始，就是全国文房四宝主要产地之一。这里文房四宝质优量多，能满足南直隶江南地区刻印图书的需要。该地区山多林密，木材丰富，书板用料能够保证。所以这里私人刻书所须主要条件较为优越。

（四）明代对手工业的政策有所放宽，其税收有所减轻。

私人刻书带有经商性质。无论社会用书量如何之大，刻书条件又如何优越，若刻书不能获利，私人刻书业是无论如何也兴盛不起来的。朱元璋对民间刻书业较为重视，并实行了特殊政策，致使该地区于明中叶私人刻书业十分繁荣。当时这里书坊林立，名工巧匠不胜枚举，所刻典籍种多量大，刻书盛况空前。

二、明代南直隶江南地区私人刻书概况

明代南直隶江南地区私人刻书中心主要有金陵、徽州两处，其次是苏州地区。现分述如下。

（一）金陵地区私人刻书概况

明代，金陵书坊很多，主要集中在三山街，其次在太学前也有一些。在不少街上时而可见“刻字”、“镌碑”等刻书雕碑的市招。在金陵书坊中，比较著名的有唐氏、周氏、陈氏几家，其次还有王氏、姜氏、胡氏、刘氏、肖氏、汪氏等家。唐氏主要有唐对溪的富春堂，唐绣谷的世德堂、唐鲤跃的集贤堂，还有唐氏文林阁、广庆堂、唐锦池等十二家之多。周姓有周希旦的大业堂，周近泉的大有堂，还有周氏万卷楼、嘉宾堂等七家之多。另外还有王举直的积德堂，姜氏的来宾楼，刘氏的孝友堂，陈大来的继志斋，肖腾鸿的师俭斋，汪氏的环翠堂，胡氏的十竹斋等，共有五十二家之多。

金陵书坊刻书，内容十分广泛，经史子集四部，凡未梓行者，无不刊印。但是刻印最多的还是插图小说、传奇、戏曲或图画。比较突出的是唐对溪的富春堂。该书坊刻书较多，尤以刻戏曲和插图见长。刻的书主要有《新刻出像音注增补刘智远白兔记》、《新镌图像音注周羽教子寻亲记》、《岳飞破虏东窗记》、《新刻出像点板音注李十郎紫箫记》、《新刻出相音注劝善目莲救母行孝戏文》、《金貂记》、《玉玦记》、《搜神记》、《三顾草庐记》、《王昭君出塞和戎记》、《新刻出像音注花栏韩信千金记》、《范睢绌记》等，共达上百种，仅传奇一类就有十多套，插图达一千多幅^⑭。书中插图刻得相当精美，在艺术上能够达到穷工极巧。刻书时在板框四周镌上雉堞形图案，称为花栏，较新颖引人。赵万里先生说：“金陵富春堂刻的戏曲，都是很好的。”^⑮陈大来继志斋刻印的书在当时也很有影响，刻的书主要

有《重校十无端巧合红蕖记》、《新镌古今大雅北宫记》、《重校锦笺记》、《新镌量江记》、《题红记》、《埋剑记》、《义侠记》、《折挂记》、《香囊记》等。所刻之书四周也有花栏，其书中插图形式基本上和富春堂的相同。另外还有一些书坊刻的书在当时也比较有影响。汪建讷环翠堂书坊刻的《义烈记》、《彩舟记》、《绘图列女传》等。唐振吾广庆堂刻印的《新刻出像蔡花记》、《新刻出像点板八义双环记》、《新刻出像音释点板东方朔偷桃记》、《新编全相点板西湖记》、《武侯七胜记》等。唐绣谷世德堂刻印的《新刻出像音注花栏裴度香山还带记》、《六子全书》、《赵氏孤儿记》、《双凤齐鸣记》、《千金记》、《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》、《唐书志传通俗演义》、《五伦全备忠孝记》、《拜月亭题评》等书。业德堂刻印的《惊鸿记》、《还带记》等。周希旦大业堂刻印的有《新刊出像补参采史鉴唐书志传通俗演义》、《东晋志传题评》等。唐锦池文林阁刻有《胭脂记》、《古城记》、《易鞋记》、《汉刘秀云台记》、《袁文正还魂记》等。肖腾鸿师俭斋刻的《琵琶记》、《红拂记》、《幽闺记》、《鼎镌西厢记》等。还有姜氏来宾楼在宣德九年印制的《大藏经》也很有名，流传至今的尚有一百多册。周近泉大有堂绣梓的《皇明宝训》，重梓的《御制大明律例报拟折狱指南》，荆山书林刊行的《夷门丛牋》等，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影响。金陵各书坊共刻书达数百种之多，光戏曲一类就二三百种^⑩。对于金陵书坊刻书质量，学者多评价较好。明谢肇淛说：“今杭刻不足称矣，金陵、吴兴、新安三地，剞劂之精，不下宋板。^⑪”

金陵书坊不仅刻书多，质量高，刻印图画和书中插图也很精美。其中以富春堂、世德堂、十竹斋、芥子园几家刻印的木刻画比较突出。富春堂于万历辛巳（1581年）刻印的《玉玦记》有插图三十一幅，非常精美，可称金陵插图版画的代表。世德堂刻的传奇，几乎书书有插图，也很精美，其版式和富春堂的基本相

同。金陵书坊刻印的插图版画，在表现手法上敢于创新。明初刻印书中插图多为上图下文，画面成扁短横幅，格式略嫌呆板。金陵书坊将其改为整板半幅、对幅或团扇式。其幅面根据内容或大或小，比较灵活悦目。雕刻风格质朴，人物形像突出，充分体现了健壮、浑厚的风趣。鸡笼山胡正言十竹斋则以刻印版画而著称。其主要代表作品是1627年刻印的《十竹斋书画谱》和1644年刻印的《十竹斋笺谱》。这是两部千古传颂的彩色套印巨制，誉满全球的佳作。李于坚说：“十竹斋诸笺汇古今之名迹，集艺苑之大成，化旧翻新，穷工极变。^⑮”郑振铎先生说：“余收集版画书二十年，于梦寐中所不能忘者，惟彩色本程君房《墨苑》，胡曰从《十竹斋笺谱》及初印本《十竹斋书画谱》等三伟著耳。^⑯”继十竹斋后，金陵李渔芥子园于明末清初刊印了《芥子园画传》一书。该书刻印得也相当精美。这是一部在中国钐版彩印发展中占着重要的地位，在传统绘画技法方面，有极大的津梁作用的书。由于金陵书坊在雕印木刻版画中敢于突破，并逐步形成了本地区特有的风格，其木刻画被誉为“金陵派”版画。

在为版画着色方面，金陵书坊也有创见。金陵版画和其他地区版画一样，也有单色和多色之分。金陵书坊在刻印单色版画时，采用的多是黑白对比法，艺术效果很好。如富春堂刻印的插图版画，常常利用大块黑地，以阴刻勾勒出事物形态，光感极为和谐，图版上的发髻、罗帏、书衣、伞盖、假山等皆巧妙地用黑地衬托，别存古调。当时金陵书坊多色印法较为先进。他们除广泛采用多色套印外，还较早地运用了“恒版”和“拱花”这一技术。恒版和拱花又叫“木刻水印”，何人发明，尚未定论，然目前发现木刻水印最早的作品是金陵书坊吴发祥于天启六年（1626年）印造的《萝轩变笺谱》。书中山水花鸟，多用线条勾勒，木刻韵味甚厚。十竹斋书坊运用此法非常熟练，且有创新。他们在用此法印造《十竹斋书画谱》、《十竹斋笺谱》时，根据不同部位需

要，又结合采用了“肉捺”、“指甲捺”等手法，效果更好。随之芥子园用此法印造了质量很高的《芥子园画传》。此技法从此流传了下来，经过不断革新，今日仍在采用。

金陵书坊当时除木刻印书外，也有活字印刷的，如胡旻用木活字于正德戊寅（1518年）排印了《庄子鹖斋口义》，李登于万历间用木活字印造了《冶城真寓存稿》。又见一张氏用铜活字印造了《开元天宝遗事》。当时金陵书坊用活字印书不多。

（二）苏州地区私人刻书概况

明代苏州地区私人刻书也较盛。据冀叔英同志统计，苏州地区仅明代中期就有刻工六百五十多人，写工二十多人。^②从这两个数字也能窥其刻书盛况之一斑。

当时这里书坊主要有：袁褰的嘉趣堂，顾春的世德堂，徐时泰的东雅堂，晁璠的宝文堂，洪楸的清平山堂，叶盛的蓁竹堂，沈辨之的野竹斋，安国的桂坡馆，金李的泽远堂，郭云鹏的济美堂，苏献可的通津草堂，江阴涂祯，马元调的宝俭堂，吴郡社诗，无锡崇正书院，秦氏绣石书堂，周南国的川上草堂，顾凝远的诗瘦阁，何良俊的清森阁，翁良瑜的雨金堂，顾起经的奇字斋，吴继的聚好堂，毛晋的汲古阁，郭邦藩的常静斋等，总共有三四十家之多。

该地区当时有不少书坊刻的书都很有影响。世德堂刻的《六子全书》，用白棉纸精印，字大悦目。野竹斋刻的《韩诗外传》，刻画极为精细。嘉趣堂刻的《文选》和《世说新语》，质量皆很高，影响较大。尤其是《世说新语》，用仿宋字体刻出，笔笔工整，一丝不苟，堪称标准吴门刻本。江阴涂祯刻的《盐铁论》，在当时非常有名。清森阁刻的《何氏语林》和奇字斋刻的《王摩诘集》，字体都极为工整，皆用白棉纸细印，非常精良，每卷之末皆刊有书牌子。像《何氏语林》书牌子为“清森阁”三字，字体呈长方形，隽秀有力，尤具特色。另外，蓁竹堂刻的《云仙杂

记》，泽运堂刻的《国语韦昭解》，宝文堂刻的《昭德新编》、《具茨集》、《晁氏客语》，聚好堂刻的《墨娥小录》，雨金堂刻的《归先生文集》，通津草堂刻的《论衡》，济美堂刻的《柳集》，东雅堂刻的《韩集》等，在当时也较为有名。

在该地区六百多名刻工中，高手很多，比较著名的有黄周贤、何钤、吴曜、吴时用等人。黄周贤刻书较多，以《方脉举要》三卷、《孔子家语》十卷、《唐诗二十六家》五十卷、《书叙指南》十二卷、《五岳山人集》三十八卷等十来种较为出名。在他刻的书中，有的被“《天禄琳琅书目后编》误认为宋刻，其雕镂之精可知”^①。何钤则以刻图见长。他刻有《浙江通志》、《类笺唐王右丞诗集》、《增编会真记》、《西厢记杂录》等书。书中的插图刻印精美，自成一派，为吴派版画之先。

在苏州地区书坊中，值得单独提出的是汲古阁。汲古阁始创者毛晋，字子九，是明末常熟著名的藏书家。其五子毛扆，字斧季，是明末清初著名的目录学家。毛晋一生，无他嗜好，惟书是癖，尤喜善本秘籍，遇有善本，重金购之。其门人“尝榜于门曰：‘有以宋槧本至者，门内主人计叶酬钱，每叶出二百。有以旧钞本至者，每叶出四十。有以时下善本至者，别家出一千，主人出一千二百。’于是湖州书舶云集于七星桥毛氏之门矣”^②。汲古阁大力收书，使藏书达八万四千册，中多善本，为其刻书提供了质量可靠的底本。

汲古阁刻书四十余年，达六百零四种（以单书计算）。其刻书规模和数量，在私刻中实属罕见，堪称空前。当时汲古阁有刻工二十人，抄书工匠二百人^③，藏放书板处，有楼九间^④。汲古阁还有校仇者，大家明确分工，俨然是一个出版作坊。汲古阁刻书内容非常广泛，除刊有非常著名的《十三经》、《十七史》、《宋六十名家词》和《津逮秘书》外，唐宋别集，百家九流，道藏词曲，以及被视为“小道”的词曲，凡未刊行者，广为搜刻，

以免绝迹。毛刻大部头丛书，板叶浩瀚。《十三经》一万一千八百四十六叶，《十七史》二万二千二百九十三叶，《津逮秘书》一万六千六百三十七叶，毛氏共刻书板达十万九千六十七叶^②，若以每叶三百字计算，达三千二百八十七万多字。其刻书规模之大、数量之多，居历代私人刻书之冠。

毛氏刻书，除翻刻外，尚能编刻。如《宋六十名家词》，就是毛氏父子把散落在民间的诸家宋词，搜集整理，汇为一编，刊布流行。就读书治学而言，编刻丛书更便于学者。

汲古阁刻书讲究质量，多用宋元善本作底本。如毛刻《津逮秘书》，皆宋以前旧帙。对于校仇，十分重视，毛氏父子亲自参加。毛晋总是“日坐其间”，“手繙诸部，仇其讹误”。毛扆校仇，一丝不苟。学者赞他校勘“极为精细”，经他校过的书，与“真本无毫发之异”。另外还延请名流高手周砚农等校仇，校经十三人，校史十七人。连印书用纸也十分讲究。“所用纸，岁从江西特造之，厚者曰‘毛边’，薄者曰‘毛太’，至今犹存名不绝”^③。为方便学者，毛晋写了二百四十九篇题跋，分附毛刻其书之后，起提要之作用，受到学者欢迎。对于汲古阁刻书质量，赞誉者较多。日本一学者也称赞说：“象毛晋的汲古阁刻本，是非常精善的”^④。

苏州地区刻工刻书有一个特点，合作刻书者较多。有两人合作的，也有叁伍人合作的。如何一德、何又、何化、何成、何礼曾同刻《宋元通鉴》、《浙江通志》、《增编会真记》。也有根据各人特长相互交叉合作刻书的。如何应元、何应亨、何应贞三人常在一起合作，元和亨曾同刻《韦刺史诗集》，亨、贞曾同刻《方山先生文录》，元、亨、贞曾同刻《类笺唐王右丞诗集》。也有和外地刻工合作刻书的。如嘉靖《南畿志》十四卷和南监本《史记》一百三十卷是顾俊、顾铨等人与金陵刻工合刻的，《书经集传》六卷和《周易程朱传义》二十四卷，是张宪、夏文德等

人与福建刻工合刻的。刻工合作刻书主要好处是：能集中力量，缩短出书时间；能各尽所长，保证刻书质量；能相互交流，提高刻印技术。

该地区当时刻书上千种（以单书算），其质量，在文章开头已经谈到，实属上等。

苏州地区的活字印刷当时较为流行。比较突出的有无锡华燧会通馆，华坚兰雪堂，安国桂坡馆。清叶德辉说：“明以来，活字板盛行，弘治间，锡山华氏（华坚、华镜）兰雪堂、（华燧、华煜）会通馆印书尤多。^⑳”明俞泰在谈及桂坡馆活字印时说：

“经史子集活字印，二十年来，无虑数千卷。^㉑”华燧在弘治三年（1490年）排印了《宋诸臣奏议》一百五十卷。以后他又印制了《锦绣万花谷》、《容斋随笔》、《文苑英华》、《百川学海》等一些大部头书籍。几乎和华燧同时的，还有华理，他在弘治十五年（1502年）印行了《渭南文集》、《剑南续稿》等书。稍后，华坚于正德八年（1513年）印了《白氏长庆集》、《元氏长庆集》，以后又印《艺文类聚》、《春秋繁露》等书。安国于正德十六年（1521年）印行了《正德东光县志》，以后又印有《吴中水利通志》、《颜鲁公文集》等书。当时常州也有活字印。明陆琛说：“近日昆陵人用铜铅为活字，视板印尤巧便。^㉒”明代苏州地区的活字印刷，在域内颇有影响。

明代苏州地区的抄书也较有影响，应该提及。明中叶，苏州的柳大中终身抄书。他用宋本抄校了《水经注》和《乐府古题要解》，被后人誉为“柳大中抄本”。与其同时苏州的朱存理专剪辑名画，抄其题跋，编成一部有名的《铁网珊瑚》，使古人名迹赖以流传。还有钱叔宝，抄有《唐代名画记》等，达数十种^㉓。抄书最突出者，还是汲古阁。当时汲古阁有抄书工匠二百名，抄了《极玄集》等很多书。所抄之品，精美无比，与原刊酷似，非细审之，实难辨出，叫做“毛抄”。底本遇有残缺，务精工楷抄

补足。这便是被人们誉之为“下真迹一等”的“毛抄”，被认为是“古今杰作”^②。段玉裁说：“凡汲古阁所抄书，散在人间者，无不精善，此书精乎精者也。”^③毛氏“影宋抄本”保存了很多宋版书的大致面目，对研究版本有非常重要的价值。如今“毛抄”已为海内孤帙，尤显珍贵。

（三）歙县私人刻书概况

歙县是明代南直隶江南地区的重要刻书中心，也是当时全国的重要刻书中心。在明代，歙县是徽州府所在地。当时这里书坊很多，比较著名的有黄氏、吴氏、汪氏、仇氏等家。其中以黄氏一门最为突出。他们世居歙县虬村，弘治间可考的黄家刻书名手有黄永升、黄永晨等兄弟十人，嘉靖间可考的有黄瑾、黄琮等兄弟十三人，下一代又有黄镗、黄银等三十三人。他们技术精湛，不仅能刻印质量很高的图书，尤擅长雕镂书中的插图或版画。他们刻出了大量有影响的作品。如黄应光于万历三十至三十六年间（1602—1608年）刻的《集乐府先春》，万历三十九年（1611年）刻的《徐文长批评北西厢记》等，黄鳞于万历二十二年（1594年）刻的焦竑撰丁云鹏绘的《养正图解》和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刻的程大约撰丁云鹏绘的《程氏墨苑》，黄一楷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年）刻的《关汉卿续元本出相北西厢记》，黄一彬于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刻的张梦徵编张学徵绘的《青楼韵语》，黄应泰于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刻的《古今女范》，黄应组于万历三十八年（1610年）刻的《人镜阳秋》，黄应瑞于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刻的《大雅堂杂剧》和《性命双修万神圭旨》，黄一凤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刻的《牡丹亭记》，黄吉甫于万历四十五年（1617年）刻的《原本还魂记》，黄君蓍于天启四年（1624年）刻的《彩笔情辞》等等，在当时都很有影响。

当时歙县刻书较多且有影响的，还有吴氏一家。吴勉学师古斋书坊刊印经史子集四部之书一百多种^④，流传至今的还有《五

经》、《四史》、《资治通鉴》、《二十子》、《四唐汇诗》等多种。其中有很多书卷帙浩繁，刊印时费工费时。其刻书规模之大可见一斑。

其次是仇姓一门。仇氏刻书略早于他氏，刻的书主要有：仇中于弘治二年（1489年）刻的《雪峰先生文集》，仇向于嘉靖五年（1526年）刻的《秋崖先生小稿》，仇钊、仇高、仇源于嘉靖五年（1526年）刻的《张氏统宗世谱》，又于隆庆六年（1572年）刻了《李诗选注》，仇寿于嘉靖四十五年（1566年）刻的《徽州府志》。

还有汪氏一门当时刻书也比较有影响。如汪一鸾万历年间刻的《淮南鸿烈解》，汪文宦嘉靖间刻的《仙佛奇踪》，汪成甫崇祯十年刻的《乐府吴骚合编》，汪忠信万历三十年刻的《海内奇观》，汪士珩、汪成甫、刘次泉合刻的《唐诗画谱》等等。这些人皆为名刻工，刻的书比较精美。

从内容来讲，歙县当时刻的书比较庞杂。上面谈及的多为插图传奇小说和话本，在徽刻中这类图书占比重较大。还有经史之类也不少，如吴勉学一家就刻了很多。其次还有三个方面的用书：1.普及教育用书。当时徽州教育比较发达，他们编刻了《历史揽要》、《全国地理歌诀概要》、《童蒙训》、《千家诗》、《千字文》等一些通俗读物。2.日用小百科全书。如《鼎镌十二方家参订万事不求人博考全编》、《徽郡释义经方士民使用通考杂字》等，内容包括天文、地理、风俗、书信、公文等，共有三十种左右^⑤。3.商业用书。当时徽州商业经济比较繁荣，商人很多，因经商需要，书坊为他们刻了不少书。如《水陆路程宝货辨疑》、《程君房墨谱》等，内容有交通、辨货、托运、广告等一些方面。其次这里还刻有像《窦山公家仪》等不少宗谱、家谱。

在徽州私人刻书中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雕镂插图版画。徽州是徽派版画的发源地。当时这里既是南直隶重要版画中心，也是全国的版画中心。当时这里版画作品繁多，且雕镂精巧，尽善尽

美。版画刻工名手辈出，其中尤以虬村黄氏父子为最。郑振铎说：“歙县虬村黄氏诸名手所刻版画盛行于明万历至（清）乾隆初，时人有刻，必请歙工，而黄氏父子昆仲尤为其中之俊，举凡镌雅秀丽，或奔放雄迈之画幅，一入黄氏诸名工手中，胥能阐工尽巧以赴之，不损画家之神态，而时亦能自行布稿作图。^⑤”黄氏刻工雕出了很多有口皆碑的版画作品。如黄铎于万历十年（1582年）刻的《目莲救母劝善戏文》，具有明快粗豪作风，黄铎有时“亦能自行布稿作图”，甚至自创画稿。黄兼宠于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前后刻的《仙媛纪事插图》，在作风上已由粗豪质朴一变而为秀隽婉丽。徽派作风自此脱去嘉隆时代金陵、建安两派之范畴，树起了徽派的独立风格。黄应光于万历三十至三十六年（1602—1608年）间刻的《李卓吾批评琵琶记》、万历四十一年（1613年）刻的《校注古本西厢记》、《小瀛州社会图》、万历四十四年（1616年）刻的《元曲选》还刻有《徐文长改本昆仑奴杂剧》、《李卓吾批评玉合记》等多种。其中以《校注古本西厢记》更为突出。该书有插图二十幅，其中“省简”、“伤离”诸幅，人物车马，山林屋宇，十分繁杂，但黄应光运用刀锋将其一一表现出来。其中山石皴擦钩斫，刀锋浑沦之处，是历代版画山水中的杰制。中国版画图录曾影印其刻多幅，可见质量之好。黄应瑞于万历三十年（1602年）刻的《古今女范》、万历四十三年（1615年）刻的《大雅堂杂剧》，还有《状元图考》、《闺范插图》、《程朱里志插图》等多种。所刻界画精整，山水、树木、楼台、仕女无不精绝。黄应组于万历三十七年（1609年）刻的《坐隐图》，其刻点粒不苟，精工富丽，并用黑白大小不同点子构成山石之凹凸及明暗面，使原画精神更为充沛，新开徽派版画之风格。其他姓氏刻工也有刻得极精巧的。如刘次泉和汪士珩、汪成甫于万历间合刻的《唐诗画谱》，是一部誉满中外的杰制。该书画“刻线稳健，刃锋不露。尤其对配景山水的皴法，大胆地

变阳刻为阴刻，颇饶趣味，在明版中不多见。所以说是此书乃‘集诗、书、画、刻四美于一集’，不是侈言”^③。“《唐诗画谱》印行之后，普遍受到欢迎，多次翻版。流传到日本，也一再翻刻，并有铜板刻印本”^④。该书画是徽派版画最突出的代表，在中国版画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

在为版画着色方面，徽州刻工也有创见，他们较早地使用了涂版和套印技术。万历二十八年（1600年）黄尚文和程起龙用套印法印出了朱墨两色的《闺范》。万历三十三年（1605年），黄璘用涂版和套印相结合的方法印出了程君房撰、丁云鹏绘图的《墨苑》一书。全书共施彩图五十幅，每幅皆有四五色，是当时着色最多的画品。之后，此法由这里传出去，对推动金陵、苏州以及其他地区的彩色印制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。

三、明代南直隶江南地区私人刻书主要贡献

（一）保存了典籍，传播了文化

该地区明代私人刻书达千余种，流传至今的仍有数百种。使很多濒于亡佚的典籍被搜刻，保存了下来。如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，辽金元明几百年无刻，传世本罕少。汲古阁于明末将其翻雕，广为传播，“学者得之，以为拱璧”。汲古阁本《宋六十名家词》，则是毛氏把散落在民间的诸家宋词搜集编刻而成。毛刻《六十种曲》中有不少是稀有的戏曲。该地区还刻出很多丛书。就保存典籍和传播文化而言，丛书作用更大，当其单本亡佚，在丛书中仍有保存流传。

（二）促进了该地区文化艺术的发展

1. 该地区明代私人刻书种多量大，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学者治学的需要和平民百姓对文化生活的要求。该地区还刻有不少教育用书，对促进教育起到一定作用。

2. 促进了“图书馆”事业的发展。在明代，该地区私人刻的书大量出售，为私人收书带来很大方便，私人藏书增长很快。日本一学者在谈及中国“明清时代的‘图书馆’”时说，“扬子江下游的江南地方”当时“出现了拥有许多藏书的藏书楼的创建者”^③。他共列举了四十一家较有影响的藏书楼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其中有二十五家属于该地区，约占总数的百分之六十一。

3. 促进了两派版画的发展

这是该地区私人刻书主要贡献之一。明代是我国版画艺术的黄金时代。明代版画在中国乃至世界版画史上，都有着举足视重的地位。鲁迅先生说：“中国木刻图画，从唐到明，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。”^④明代版画作品繁多，风格不一，出现了新安（徽州）、建安、金陵三大画派。其中有两派属于该地区，而徽派又是三派中最杰出的代表。

优秀的画稿要成为优秀的画品，主要取决于刻工的雕印水平。徽州、金陵两派大量的优秀画稿和各自独特的风格，也必须通过刻工刻印才能表现出来。当时这里刻工中名手如云，两派要求的刀法，他们非常娴熟；要求的线条，他们能准确刻出；对人物和背景的刻画，以及色彩的要求等，均能达到理想的效果，刻出的画品丝毫不损画家之神。画稿中若有不足，他们多能发现，建议作者修改，或用刀锋补足。万历辛巳（1581年）金陵富春堂刻印的《玉玦记》的三十一幅插图，也精美无比，可算是金陵派版画的代表作品。

（三）在校仇典籍、识别版本和刻印版画方面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。

刻书离不开版本学和校仇学。该地区明代私人刻书历史悠久。在长期刻印实践中，不少人在校仇典籍和识别版本方面，积累了丰富的经验。当时汲古阁刻书最多，其主人毛扆这两方面经验更显丰富。

汲古阁刻书，毛扆是主要校仇者。毛扆校仇，有所创见，在辨字体方面较为突出。在古代，不少学者对纠正误字不太讲究。他们认为，“鲁鱼必仇”，若“字同体异，毫发必校”，乃是“刻舟求剑”，实无必要。毛扆则不然，他认为，对于字体，有的要改，有的可不改，要视具体情况：若体异而音义同，如“謠、歌”，可以不改；若体异音也异，如“余、予”，不改不可；若毫发之差，截然两字，如“纸、紙”，不可不改^①。他不光识别误字敏锐，还能说出其错因。他在校刻《松陵集十卷》时，所撰“辨字体一跋，开卢抱经、黄尧圃之先声，在校勘学上颇为重要”^②。

毛扆鉴别版本的能力较强，经验较多。他认为，辨别版本，要从题跋、藏章、牌记、字体、款式、讳字、纸墨和有无剗改等方面着眼。毛扆判定版本之法，我们今日仍可采用。

该地区在刻印典籍方面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，表现在雕印版画方面，更为突出。他们刻印版画的主要经验是，画家、刻工、印工三者紧密配合，协调一致，互为补充，改变了以前三者互不联系的状况。他们用这种方法创作了大量的优秀画品。如画家陈洪绶与徽州刻工黄建中于崇祯九年（1636年）共同创作了《九歌图》。该画刻印极为精工，线条拙朴，刀法严谨，不失画意，且独具一格。由此可见，此书所成，是画家、刻工、印工三者通力合作和长期研制的结果。画家、刻工、印工三者结合起来，共同创作版画的经验，时至今日，仍值得借鉴。

另外，该地区私人刻书对发展当地的工业生产，繁荣商业经济，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。

注

①明胡应麟：《少室山房笔丛·甲部·经籍会通四》。

②《明太祖实录》卷一七六，洪武十八年十一月甲子。

③《明太祖实录集》卷七六，洪武五年九月。

④⑤《明史·食货志》。

- ⑥明余继登：《典故纪闻》卷一。
- ⑦《钦定国子监志》卷十八《外藩入学》条。¹
- ⑧柳诒征：《五百年前南京之国立大学》。
- ⑨道光间《徽州府志·营造志·学校》。
- ⑩康熙间《徽州府志·营建志·学校》。
- ⑪《明万历会典》卷一七。
- ⑫顾炎武：《日知录》卷十《苏松二府田赋之重》。
- ⑬⑮⑰⑱毛春翔《古书版本常谈》（页五十、五十、六十）
- ⑭⑯张秀民：《明代南京的印书》，肖东发：《中国古代的民间刻书业》。¹
- ⑰李于坚：《十竹斋笺谱·小引》。
- ⑲郑振铎：《劫中得书记》。
- ⑳冀叔英：《谈谈明刻本及刻工》，载《文献》第七期。
- ㉑㉒《汲古阁校刻书目》。
- ㉓毛扆：《五经文字·跋语》。
- ㉔钱泳：《履园丛话》。㉕《常昭合志稿》。
- ㉖㉗《中国图书馆の系谱》，载（日本）《图书馆界》。¹
- ㉘叶德辉：《书林清话》卷八《宋以来活字板》。
- ㉙桂坡馆刻本：《初学集跋》。
- ㉚《丛书集成初编》本《金台纪闻》。
- ㉛㉜谢国祯：《明清时代版本目录学概述》。
- ㉝孙从添：《藏书纪要》。
- ㉞段玉裁：《集韵跋语》。
- ㉟丁瑜：《我国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比较研究》。
- ㊱郑振铎：《中国版刻图录序》。
- ㊲㊳《唐诗画谱》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序言和出版说明。¹
- ㊴鲁迅：《木刻纪程·小引》。
- ㊵《松陵集十卷》（顾广圻手移毛扆校宋本）卷二末。
- ㊶王重民：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（页四五八）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淮北师范学院图书馆